

參閱文稿

北京華研有限公司
(香港) 桑尼研究公司

No. 2014~44

2014年9月12日

催化“文革”的社会心理势能

韩少功¹

红色中国一开始就陷入乌托邦之困，困于一个人口大国的治理手段短缺。一批造反者荷枪实弹闯进了京城，面对满目疮痍的一个烂摊子，要在紧急状态下迅速实现强国，需要超强的管理和异乎寻常的社会动员力。但把所有的工具摆上桌面，就不难发现宗法缺位（族权废止），宗教缺位（神权几乎废止），而更重要、更普遍、更难办的则是金钱缺位。所谓资源匮乏，说白了就是缺钱，常处于左右支绌兜不住的困境。同步到来的条件是全球红色文化让钱的名声可疑；集权制度传统让钱的效能退减……诸多因素在此叠加，“物质刺激”就只能是一条残腿，进入战略设计的概率实在太小。奖金、股权、地权、佣金、版税、红利、年薪

¹ 本文摘自作者《革命后记》（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）。印《参阅文稿》时再次修改。

制、专利费、财产私有制等这些正常国家行之有效的的手段，统统不合用和无法用。连当时的行政处分和法院判案也几无罚金一说，一大原因是：必需品分配仅能“保基本”，让大家都罚无可罚。

也许明眼人都能看出：此时桌面上所剩的工具只剩下权力，或者说政治。这个国家只能比一般国家更多借助和依靠权力。政治的微笑化、鼓掌化、皆大欢喜化已不可持续。政治荣誉、政治安全、政治地位、政治权力几乎成了唯一的分配品，是针对任何不服从者的唯一可剥夺物，相当于唯一的社会操控杠杆。

换句话说，攀比与竞争是人性基本面之一，当人们的利益被一种平等分配体制锁定，当任何人不可能在财产私有制取消后思富和求富，大富和暴富，夸富和炫富，新的“利益”便登场了，或说开始凸显——政治荣誉、政治安全、政治地位、政治权力不过是新的面包，隐秘的利润和股权，同样能引起斤斤计较。当唯物主义者挟“上帝死了”的时代大势，在高歌猛进的科学潮流下唾弃宗教，那也不过是关闭另一扇求富之门——天堂、地狱、六道轮回、因果报应之类，作为宗教所许诺的彼岸奖罚，相当于面包的期权，亡灵的保险受益资格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当生前与死后的利益都不容异动，那么新的“利益”便是唯一的利益。换句话说，唯政治荣誉、政治安全、政治地位、政治权力构成市场流动性，势必被公众趋之若鹜。天下熙熙，皆为政治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政治往。“文革”的熙熙和攘攘有何难以理解？

如果说逐利，这当然是一种非物态的逐利。

如果说利益最大化，这当然是一种非物态的利益最大化——至少在政治权益可兑换成实惠前是这样。

我们有什么理由采取双重标准，把这一些再寻常和再务实不过的逐利者，看作一大群疯子？我们有什么理由对逐利这一最基本的人权和最

普世的生物性大惊小怪，然后对自己的逐利业绩倒是津津乐道？

这事其实早已不算新鲜。法国学者鲍德里亚（Jean Baudrillard）已敏感到非物态的利益。比如在《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》的研究中，他认为所谓“现代”是以工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霸权上升为特征的生产时代，而所谓“后现代”则是一个由符号、代码和模型控制的模拟时代。在后一种处境里，消费实际上已经超出实际需求的满足，变成了“符号化物品”、“符号化服务”中所蕴含的“意义消费”。² 另一个法国学者布尔迪厄（Pierre Bourdieu）没走得这么远，仍对物质和经济保持足够重视，不曾把马克思学说视为“蒸汽机时代”的“拜物教”（鲍德里亚语），但也对“文化权力”和“符号资本”备加关切。³ 他们的思想焦点从物质移向精神，从实体移向符号，从生理需求移向心理需求，从使用价值移向意义价值。这当然较容易解释当下的媒体社会，解释名牌汽车、名牌衬衫、名牌手袋、名牌月饼一类现象，解释为何有些人哭着喊着就是“不要最对的，偏要最贵的”。家住你隔壁的那哥们，花一千元买下一盒月饼，较之于 20 元一盒的月饼，吃起来差不多，似乎买得很亏，但他大举砸钱买下一堆精美包装所带来的体面感、愉悦感、阶层认同感等，可能“比现实更现实”（鲍德里亚语），比利益更像利益——据说这就是后现代社会的新法则，被传统学界忽略。

非物态利益并非后现代专利，与经济发达和物质剩余并不构成唯一关联。在物质短缺的年月，鲁迅小说中的阿 Q 与王胡早就开始计较面子，计较一个咬虱子的响亮度，为此一决高下大打出手。⁴ 肥大虱子所引起的荣耀之争，一场穷光蛋之间展开的心理侵占和精神屠杀，在这里

² 见鲍德里亚：《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》，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。

³ 见布尔迪厄：《关于电视》，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年；《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。

⁴ 见鲁迅小说《阿 Q 正传》，载小说集《呐喊》，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6 年。

也是“比现实更现实”。在物质利益大体冻结的时代，因种种特定条件，“文革”也可以成为一个符号的大产地、大卖场、大股市——别无选择的民众心理需求悉数汇集于此，犹如过量的现金流入市，推动了一波又一波山呼海啸的追涨杀跌，使各种政治符号的价位不断飚升。这些符号若虚若实，不像物质财富那样看得见，摸得着，容易算计，让经济学家们用不上方程式和微积分，但它们构成了当事人最真切的日常感受，同样是可以占有的、流转的、储备的、剥夺的、对冲的、炒作的、分配的、垄断的、继承的、价位波动的……一个人只要稍有想像力，几乎可把经济学的全部用语抡上来，用于这个符号生产和消费的全过程，得出权力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系列恰当隐喻。

这些甚至不是隐喻，不过是实说，只是我们的一条舌头被语言旧习切割，在经济用语之外显得词汇太少。

一条红领巾就是这样的符号。

当年有的小学生为了得到它，不仅抢先擦黑板和擦窗台，放学途中还眼珠贼溜溜地转，太想捡到一个硬币甚至一个钱包，去交给老师以示自己高尚无私——我就有过这样的勾当。

有的孩子为了得到它，去老师那里揭发同伴的劣迹，包括偷摘桃子、街头打架、往女同学的抽屉里撒尿，一心树立坚持原则爱憎分明的自我形象——我的一位发小就是这样成功的。

有的孩子为了得到它，在防空演习中拽住一个小同学，硬要对方趴下，见对方不配合，便一脚将其踢翻在地，自己再重重地压上去，压出了身板下一阵哇哇大哭——他觉得电影中的英雄掩护战友就是这动作，自己万万不可放过勇敢一下的机会。

还有的孩子为了得到它，常去公园、广场、街头巷尾侦察巡逻，看一些形迹可疑的男女是否在偷偷拍照，是否在提包里暗藏了发报机——

他们觉得来自台湾和美国的特务一定鬼鬼祟祟，一定长得歪瓜裂枣，时不时向同伙打暗号，最终不可能逃脱自己的火眼金睛。他必须为革命一鸣惊人，让老师和同学们从此刮目相看。

……

多年后的孩子们可能十分困惑：不至于吧？一条红领巾，一个加入少年先锋队的资格，又不是什么智能手机或高考加分，怎么就让那些家伙中了邪？一旦时过境迁，当社会出现了多元价值标准，有了其它领域里的竞比，比方看谁的滑轮鞋更时尚，看谁的摇滚唱得更酷，看谁的电子游戏装备更多，看谁的全家出国旅游更 High……一条红领巾当然大大失重。谁要是为它焦虑不堪，肯定被同学们觉得脑子进水。谁的父母要是抓肝抓肺地逼儿子写上几十份入队申请，肯定被其他学生家长笑晕。不过，这个道理的另一面恰恰是：正因为缺失滑轮鞋、摇滚乐、游戏装备以及出国旅游，红领巾才会成为校园里最重要的符号，最重要的人生增值，在生活中的相对权重大大增加，在感受中的边际效应突然放大——那些小屁孩，即便没怎么“后现代”，还是会情不自禁地为之挖空心思千辛万苦。

事情不可能有别的结果。

在这里，他们通常会采用两种竞争方式：

一，奉献型竞争，如表现自己的无私（拾金不昧），释放自己的勇敢（义救战友），如此等等。

二，攻击型竞争，不是针对自己的伙伴（揭发劣迹），就是针对幻觉中的敌人（搜捕特务），如此等等。

奉献与攻击其实是同一种竞争，用力方向不同而已，分别指向价值标尺的两端，即自我成圣和外在擒魔。

全民圣徒化

奉献型竞争的结果，是全民“圣徒化”。

“圣徒”一词在这里也许不大合适，因为真正的圣者习惯于“自我立法”（康德语），明心见性，替天行道，无须参与什么竞争，更不会在意他人的脸色。中国人所熟悉的彭湃大概就是这样。这位大少爷生于钟鸣鼎食之家，即当时少见的大宅豪户，自述家况是“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 1500 人。”“男女老幼不上 30 口，平均一人就有 50 个农民做奴隶。”他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求学归来，从自家开始革命，亲自把田契分送给佃户，见对方不敢要，便把他们召集起来，当众烧掉所有田契，宣布“日后自耕自食，不必再交租谷。”从那一天起，他戴上竹笠，光着脚板，带着旱烟袋，用通俗的语言与农民交谈，不久便成为当地农民运动的领袖。显然，他走向革命并最终就义刑场，既不是求现世的衣食，也不是求来世的福报，与任何利益没关系。

如果说造反常有贫困逼迫的利益动机，苦行常有上帝补偿的宗教背景，那么 20 世纪一批出身于豪门的无神论者，奋发蹈厉，救国救民，堪称人类精神史上一大奇迹，表现出人格最可能的纯度与高度。邓稼先也是一例。身为北大教授之子，他在美国拿到核物理博士后一周之内便匆匆回国，一头扎进国家的原子能事业。他与杨振宁是老乡、发小以及专业同行。较之于后者在美国的优越生活，还有一份诺贝尔奖的殊荣，他默默工作在戈壁滩上，过了八年啃窝头吞咸菜的单身汉日子，身受核能射线伤害，谈不上什么世界量级的理论建树，当然是亏大了。只是 20 多年后杨振宁访华，问及中国的原子弹成功是否有外国人参与其中，他一时不便回答，直到对方在上海即将登机回国，才托人捎去一张纸条，竟让对方泪流满面。其实，那张纸条上只有简短的一句：你所知道的这

一切全系“国产”。

诺贝尔奖得主的泪水至今是谜。他揪住纸条时的泪奔，是哭老同学的一生清贫一生沉寂一路坎坷，还是哭自己至尊至荣却永远错失了一个机会，还是哭舷窗外那一片正在下沉的熟悉山河突然模糊难辨？

百年中国充满了太多泪水，布满了彭湃、邓稼先这样的精神之星，提供了一个古老民族成功自救的闪闪注解。但理想与信念在任何时代都是稀缺品，借用前人“君子”之说，“真君子”以外不乏“仿君子”，还有“假君子”，如同星星之外有光晕，有黑暗，构成了更大的精神空间。

我的一位罗姓插友，因略通平仄便自叹诗才埋没，中年以后总是抱怨当年：他在一个小山村当民办老师，负责四个年级共十几个孩子，又当老师又当保姆还得种菜喂猪，那算是人过的日子？他砍柴时被蚊虫叮咬得满头是包，挑水时滑到水塘里差一点淹死，有一次在卧房里还踩到蛇，遇到哪个孩子内急，裤绳打成了死结，他解绳结解出了自己一头老汗，直到对方最终哗啦一声拉在裤裆里……一位诗人的青春年华就抛掷在这种臭烘烘的气味中。

从他的抱怨可以看出，他根本不愿那样做。如果他那样做过，真真切切那样做过，不是什么理想和信念作祟，不过是被奖状一类政治符号逼的——何况这些符号可能兑换成今后的某些实惠，比如招工回城。据实而言，他只是被一场圣徒化运动压迫得喘不过气来，每有一份奉献，心头便暗积一份委屈；做出的业绩越多，委屈感就越强；直至形成一种越来越大的心理势能，最终像堰塞湖一样溃坝，滔滔抱怨一泻而出。“我那时候蠢得像一头猪呵！”他眼下不能不这样大骂。

但那时的他又能怎么样？人家老太太都在大雪天里光着膀子出工，人家铁姑娘不找到矿苗就决不结婚，人家知青伙伴为救一头猪仔毫不迟

疑地往粪池里跳……他没法不随波逐流，终于做成了一个陌生的自己。

与他的情况相似，在通向“文革”的岁月里，理想和信念喷薄而出，中国有千万个王进喜在餐风宿露之地奋斗，千万个焦裕禄在凄风苦雨之时拼争，千万个雷锋叔叔在街头扫地推车扶老携幼——我的同辈人哪个没这样争先恐后过？“毫不利己专门利人”的热潮席卷全国，人们看上去都是“颗颗红心向北京”，都是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”。特别是一些党团员，依照公认的道德标准，他们的天职就是充当圣战死士，奋勇当先，指哪打哪，决战决胜，“一辈子吃下两辈子的苦”，成为激励民众的行为示范。但潜在抱怨者肯定不是少数。他们也奉献了，不过是被动员会、表彰会、总结会、现场会、报告会、讲用会一类轰上阵的。一句流行语是：“国民党税多，共产党会多。”当后者缺失了“税”一类经济手段，“会”就成为工具替代，成了权力运作的主要舞台，社会各方心力交集的高压区。哪怕是一个闲会，一堆车轱辘话磨牙齿，没什么实质内容，但坐席排序已是等级的高清显影，口气和表情已是权力的现场升压，其实还是颇有内容的。在旗帜、会标、口号、齐唱、领袖画像所组成的严重气氛下，革命潮流气场强大，声势逼人。一次点名批评，一些受奖名单的宣布，更不说当场生效的提拔或罢免，都构成了政治权益的动态性再分配。哪怕是台上人的一个脸色，也能播下小情绪和微感觉，让当事人明白自己的盈亏，接下来的被孤立感、被排斥感、被歧视感、被压抑感将如何增减。

美国苹果公司的乔布斯曾有“现实扭曲力场”一词，发现精神、氛围、愿景、领袖魅力可引爆生产力的奇迹。⁵ 如果他见证过“精神原子弹”（毛泽东语）在中国的巨大冲击波，恐怕会更多几分惊讶。还需要

⁵ “现实扭曲力场 (Reality distortion field)” 是苹果公司内部在 1981 年创造的新词，用于描述靠精神力量打造现实奇迹。

什么物质刺激的解决方案吗？一时间，王进喜、焦裕禄、雷锋等英模效应热遍全国，连酒鬼、泼妇、小偷、懒汉、烂崽都汇入了“六亿神州尽舜尧”（毛泽东诗句）的道德满堂红，在思想改造的速成班毕业。1949年后的生产热潮、学习热潮、节约热潮、技术发明热潮、技能竞赛热潮、水利建设热潮、捐金献玉买飞机的热潮、抗美援朝战场上杀敌立功的热潮、打苍蝇灭老鼠的文明卫生热潮……都是在没有奖金和股权的情况下实现的。有时拿一条毛巾或一个搪瓷杯作为奖品，就算是重奖了。上一次红榜，就相当于董事会派送干股了。劳动成了个人或团体的擂台赛，于是充满体育竞比的乐趣。贫困被更名为“朴素”和“磨练”，也成了骄人的心理资本。大会小会之下，民风改观，民气高涨，民心亢奋，圣徒化看上去已成为人民主权实现的标准风格和必然气象，成为人类正义事业的无限活力。万千国民都以义工或半义工的方式投入新时代，以殉道或准殉道的风格改天换地，岂止是“现实扭曲”，完全是现实魔变。连我的那位罗同学也响当地混上了“优秀教师”，把村里的娃娃一个不少送上了知识之途。他未必知道，正是像他样的乡村教师，大大降低了全国的文盲率，成为中国日后变身为制造业大国的重要条件——多年后的一天，一位外商对我说：东南亚的劳动力价格不到中国的一半，印度和孟加拉的价格更低，但他决定把工厂办在中国，第一原因就是看中了这里打工群体的能读会算，综合素质较高。

我把这事说给罗同学听时，他眼里一片疑惑。他不觉得自己与那些外商有什么关系，与眼下的市场经济有什么关系。

如果听懂了，明白军功章也有他的一小半，他倒可能更加愤怒：“鬼佬发财，能给我一毛？”

但一个隐秘的故事就这样发生，甚至不为千万当事人所觉——无论这些人是高纯度的君子，还是跟潮者或胁从者等低纯度多数。据国际学

界普遍接受的麦迪森 (Maddison) 数据, 以实际购买力的标尺换算, 1950 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448 美元, 低于同年印度的 619 美元。但这个数据到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前的 1978 年已达 978 国际元, 超过印度的 965 国际元。⁶ 麦迪森后来还认为, 中国 60 多年来的官方数据前偏低后偏高, 若按不变价格计算, 1978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应向上修正 26.7%,⁷ 即反超印度的幅度更大。另据世界银行有关数据, 中国的识字率至 20 世纪末已超 90%, 而印度的文盲率仍接近 40%。1962 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反超印度, 至 1978 年已约高于印度十年。⁸ 由汽车、喷气式飞机、万吨轮、万吨水压机、“两弹一星”等组成的初步工业化体系, 不仅使中印两国拉开较大差距, 在世界上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里, 也不失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。

* * *

“文革”结束前的近 30 年经济发展是急就章, 粗线条风格, 其中景和远景的效果不错, 一到微距镜头下便问题如涌, 少不了用风箱拉出来的土产铁锭, 用锤子敲出来的杂牌汽车, 用算盘扒拉出来的导弹轨迹参数。但中央集权和强势政府的短处是民意上达难, 长处是社会动员易, 集中力量办大事倒是不时得手。在某种意义上, 这种穷人版和冷战版的强国方案, 一直使西方主流学界困惑和惊讶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·福山在冷战后欢呼“历史的终结”, 在其新作《政治秩序的起源》中却认为:

⁶ 出自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·麦迪森 (Angus Maddison), 载《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》, 新华出版社 1999 年。

⁷ Angus Maddison 和 Harry X. Wu: *China's Economic Performance: How Fast Has GDP Grown; How Big Is It Compared with the USA?* 2007 年。

⁸ 转引自《亚太研究》杂志, 2009 年第五期。

“印度民主明显的混乱和腐败，常与中国快速和有效的决策形成强烈对比”。⁹

比发展粗线条更为触目的，如果置于高倍数放大镜下，当显现为一种群体心理的异化。但人们对此倒是很少注意。

似乎是印证“利弊相生”的老话，这种异化不过是全民圣徒化的 B 面，热浪下的暗流。1957 年后，随着反右运动加剧全国性紧张，看似低成本 / 高效能的政治杠杆出现高烈度效应，撕开了一道道社会裂痕。竞胜者们上红榜，戴红花，去北京观礼，与之相反的是罚站、罚跪、游街、上漫画、挂黑牌、学驴叫、挨耳光、剃光头、脱衣挨冻、降工资、丢公职、劳动改造、遣送回乡、被拘下狱……常常成为“插白旗”或“划右派”“划右倾”的具体落实形式，成为惩戒的各种新招。此时的荣誉分配，实际上已成权力分配，甚至权利分配——与各种物质利益开始挂钩。换句话说，如果说此前的奉献型竞争大体上源于某种精神动员，由志士英模一类提供引领，那么此后便更多出于强权威逼，不但“触及灵魂”，而且触及皮肉，羞辱和迫害足以令人惊恐。

事情正在一步步起变化。

有利益就有投资。有暴利就有投机。投机无非是向前多走了半步，滑入了投资的脱轨。一个政治股市的全面沸腾必然诱导大批投机者建仓做多，股价一路拉抬疯涨，与真实价值严重背离。假君子本是生活中潜在的大数，本就鼻子最灵，一旦嗅出新的影子利益所在，拍胸脯、放豪言、大张旗鼓的调门便没法不火爆，说假话越来越吃得开。你的指标高，我的指标更高；你的口号响，我的口号更响；你的业绩感人，我的业绩更感人……这种奉献的口水化往往使真君子相形见绌，甚至成为彭德怀那样的破产户，蒙受“保守”、“右倾”、“右派”、“反党”等各种

⁹ 引自弗朗西斯·福山：《政治秩序的起源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。

恶名。

很多暴动者在革命后尚缺乏足够的知识技能，更未转型为专业经理，甚至不知专业经理为何物，于是更容易在效忠上下注，使经济活动全面政治化。这正是“大跃进”最大的风险。心存战争年代捷报频传的回忆，毛泽东当然不缺美国学者沃马克（Brantly Womack）所说的“独断的乐观主义”，¹⁰ 以至他 1956 年就大胆提出“中国第一”的战略目标，其抱负惊世骇俗；后来受苏共赫鲁晓夫“15 年内赶超美国”的刺激，把不久前“50~60 年”的时间表大大提前，锐减为“25 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”，¹¹ 一心轰油门，截弯道，过载超车，尽早把美英列强甩到后面去，一吐民族图强的心中恶气。他批判以周恩来、陈云为代表的“反冒进”，批判彭德怀等人的“右倾机会主义”……无不出于这种急于求成之心。

但毛泽东从来都是乐观主义者，为何偏偏失手在这里？一些党史专家说他“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”，“不熟悉经济规律”，¹² 没怎么挠到痒处。一介书生变身为常胜的三军统帅，变身为统战高手和舆论大师，其看家本领就是边干边学，以实践为师，为何反被和平时期的炼钢和种粮难住了？炼钢与种粮，不是什么高科技，不会比打仗更难学。这事很多人都干过，几百年甚至千多年前就干过，在不用躲炸弹、不用吃野菜、要人力有人力、要时间有时间的情况下反而干不好了，相关经验高深莫测，有点说不过去。还有些党史专家把事情归因于他“出国太少”，不像周恩来、邓小平那样容易“接受现代化的新观念”，¹³ 更是经不

¹⁰ 沃马克称之为“毛泽东政治思想两个特点之一”，见其《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》附录二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。

¹¹ 引自毛泽东：《介绍一个合作社》，人民出版社 1976 年。

¹² 引自《中国共产党历史》第二卷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。

¹³ 见金冲及文，〈新中国的前三十年〉，载《文史参考》杂志，2011 年第 13 期。

起推敲的市井之议。邓小平在法国喝过洋水，但他后来问：“‘大跃进’，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，我们不发热？”¹⁴ 钱学森，一个双料博士，一个旅美教授，国外的见识要多少有多少，后来同样公开撰文对“亩产万斤”的粮食乌龙提供理论上的可能性，¹⁵ 客观上未能阻止人们的冒进。

事实上，正如一些人注意到的，相对于不少同事，毛泽东学习经济没少下功夫，曾密集求教于有关专家，对苏俄教训殚精竭虑，在大江南北的视察日夜兼程。同是相对于不少同事，他很多时候还相当审慎。当河南省委第一个提出“苦战三年，改变面貌”，他提笔加了两个字，把后半句改为“基本改变面貌”，提倡留有余地。接下来，在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，在同年的武昌会议，他都表示要“反左”，强调“压指标”，肯定“商品经济”；在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，他重提“价值规律”，疾呼“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”（客观上阻击了高征购），其观点被很多与会者疑惑甚至抵触；在1960年，他亲自起草中央的〈紧急指示信〉，严厉批评“共产风”；在同年12月的北京会议，他指出“天灾”以外有“人祸”，让很多听众吃了一惊；在1962年的北京“七千人大会”，他更是部署全国经济工作的向右调整¹⁶……要命的是，他一次次警惕浮夸，却把最大的浮夸放过了；一次次提倡调查，却把最该做的调查忽略了。无论是处理上左而下右，还是处理下左而上右，他始终把“六亿神州尽舜尧”的假相当成真实，把“群众要搞”、“群众发明的”、“不能让群众泄气”、“保护社会主义的积极性”¹⁷ 当作调整底线，却不明白正是这种“积极性”水分极大，是一颗嘀嗒声越来越

¹⁴ 引自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二卷，人民出版社2001年。

¹⁵ 见钱学森文，言及光合作用尚未被充分利用的问题（《人民日报》，1958年4月29日）。

¹⁶ 以上见王任重日记、薄一波回忆等：转引自《中国共产党历史》第二卷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。

¹⁷ 王任重日记、薄一波回忆等：转引自《中国共产党历史》第二卷。

响的定时炸弹。

当道德与政治合成一把尺子，政治高调成了道德强势，道德上迸发了政治拉风。这相当于以政治劫持和架空道德，造成毫无底线的虚夸之辞决堤泛滥。正是在这里，要说头脑发热，与其说毛泽东热在“建设经验不足”，勿宁说他热在对人性和民心高估，对各地、各业、各级的激情秀失察，对投机者们的忠诚态和豪壮态误判，从而对一个权力社会的体制弊端缺乏准备。他越是求教、问计、视察、调查，倒越可能困于谎言和虚夸的汪洋大海，越可能被四面八方的“积极性”迷惑。他在这一过程中的失误既是主动的，也是被动的。说主动，是因为他倡导、推动、相信了全民圣徒化运动；说被动，是因为众多假圣徒最容易充斥他的视野，最容易毒化公共舆论和国情认知，造成经济工作的盲动。因此，他还来不及高兴工业化开局的成功，来不及高兴国家周边军事压力初步缓解，一大堆权力社会所产生的巨大政治泡沫，一种信息扭曲机制由层层谎言织就和滚结，最终把他架起来，投入了要命的1960年。

他后来说：“饿死人，到196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。”¹⁸迟到的真相终于引起高层一片震惊，国务院顷刻之间几成救火队，进入紧急状态，总理废寝忘餐抓粮食，每周都要核查各省存粮数、缺粮数及运输计划，连火车车皮都要亲自具体安排。但事情已有些来不及了。全国的浮夸风带来高征购，早把很多农民的口粮和种子征走，使不少地方哀鸿遍野，乞丐如潮，野菜都挖无可挖，完全不是新闻报道中粮食多得让人发愁的那么回事，不是上报材料中吃肉要广泛动员的那么回事。有些地方官员明知民众缺粮，还打肿脸充胖子，同意向外地调粮，更加剧了灾祸。陈云后来强调：“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”，显然就是指这一类情形。据官方资料，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一千万，1961年又减少348

¹⁸ 转引自见金冲及文，〈新中国的前三十年〉，载《文史参考》杂志，2011年第13期。

万。¹⁹ 后来右翼学者多认为这个数据不实，估计饿死者高达三千万，甚至 4.5 千万。

到底是几个千万，至今争议未绝，各种出于估测的数据难于定讞。也许这事对于统计质量的较真有意义，在历史反思中差异并不大。即便取其最低数，一千多万已是整个全球一战的死亡人数，相当于 50 次唐山大地震，摊到每个大省都接近两次。即使再挤去一些人口统计混乱中可能的误差，仍是惨绝人寰之祸，发生于一个和平时期，难道不让人目瞪口呆？

惨祸重罪无法开脱。我身边很多知青的相似经验是，农民们每当被干部组织起来“忆苦”，最常谈及的“旧社会”之苦，一是躲债和逃荒，二是日军侵华，三是“大跃进”，总是搞得主持人啼笑皆非。主持人把后一个话题一掐再掐，但诉苦人声泪俱下一次次绕回来，看似稀里糊涂缺心眼，其实是忠直与顽强。

据说，正是在这一年的某日，毛泽东在卫兵面前失声痛哭，决定不再吃肉，与全国人民共渡难关，直到自己患上水肿病，一年后瘦了十多斤。²⁰

全民警察化

李准编剧和鲁韧导演的《李双双》，是“文革”前流行影片之一。片中的女一号李双双是人民公社社员，有火辣性格和一张快嘴，最爱“管闲事”，经常同村里的自私落后现象展开斗争，因此屡被丈夫埋怨。丈夫喜旺顾及情面，怕得罪人，遇到妻子在外生事，便不论是非一味软弱，

¹⁹ 引自中国社会科学人口研究中心编：《中国人口年鉴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。

²⁰ 见李银桥：《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》，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。

出面向对方的对方赔不是。俩夫妻在一系列纠葛中打打闹闹，哭哭笑笑，分分合合，最终当然是妻子的共产主义精神大获全胜，并且揭发和制止了金樵、孙有贪污运输费的劣迹，保卫了集体财产。生产队一片麦浪滚滚的丰收景象里，双双与喜旺也花好月圆，恩爱更深。

这一影片广受热捧，家喻户晓，其思想取向成为后来很多文艺作品的母题，催生了《家庭问题》、《年轻的一代》、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等热片，显示出此时的政治气温一路推高，监督和批判已深入家庭，深入基层，遍及社会每个角落。一种严肃的政治是非之争，哪怕在夫妻之间也难免——虽然《李双双》尚处于温和阶段，以男欢女爱落下了甜蜜的句点。

喜旺的人情主义其实来自古老的文化纵深。胆小、圆通、苟且、无原则、随波逐流、和光同尘，即孔子所痛恶的“乡原（愿），德之贼”²¹也。这种农耕定居社会里常见的处世态度，这种熟人社会里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万能笑脸，认情不认理的泥水匠工夫，一直构成了国家再造的文化性格缺陷，哪怕在“文革”结束多年后，也仍是众多“人情票”和“人情案”的酵母，是生成腐败的心理土壤，危及民主与法制。在很多人那里，有时只不过是一两年的同窗之谊，不过是一两次碰杯之欢，就足以使人胆比天大，做假证或做假账比喝水还容易。宁可得罪君子，不可得罪小人。只要与自己无关，与自己的亲友无关，再臭的一团狗屎也忍得下。许多知识精英对此不可药救的人情泥潭一直痛心疾首。手机上一个段子说：“中国人可山寨一切，只有民主与法制山寨不了。”

对物的山寨当然易，对人的山寨当然难；正如关于物的理科教学易，关于人的文科教学难。人的血管里流淌着文化习染、知识沉淀、制度烙印、自然禀赋等，任何云计算和大数据也难以确切描写。

²¹ 引自《论语·阳货》，载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中华书局1983年。

面对这一泥潭，彰公法而抑人情，展开广泛的刮骨疗毒，倒像是针对中国传统的一次空前挑战。这里的大义灭亲和大公无私，更多一些商鞅、李斯的古代法家风格；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习惯，接近西方的宗教，比如基督教的忏悔，基督教的诫训，基督教徒小组定期聚会的“证道”——大家围坐一圈，现身说法，勤加检讨，洗心革面，努力改造世界观和人生观，相当于基督版的“支部会议”、“组织生活”、“内部整风”。这种大规模的民间心灵再造，充满着法家的严厉感和宗教的神圣感，以千万个李双双围歼“人情风”，与“乡原”确实格格不入，不失为新民运动的大破大立，史无前例的急风暴雨。

卖淫、赌博、毒品、走私、会道门、童养媳、小老婆、高利贷、人口买卖、诈财的神婆巫汉……这些旧中国的毒害尽遭打击，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，不仅让国民们印象深刻，也让很多访华的外国人惊讶，包括一位英国作家，后来被美国前总统杜鲁门秘密约谈，应邀写出专题报告印发给民主党的外交事务咨询委员会。²² 一般意义上的犯罪率，据联合国国际犯罪防范中心数据库，取1950~1965年间中国的最高值十万分之64人，较之于2000年的360人，尽管立案门槛前低后高，可比性大打折扣，仍只够六分之一。²³ 其中“文革”前夕的1965年，犯罪立案率接近最低值，每十万人中仅29人，²⁴ 不足同期美国的70分之一。²⁵ 时值美国约翰逊政府发动“囚犯战争”（War on Prisoners），夜不闭户和路不拾遗在中国很多地方却成为寻常。作为一个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女

²² 见记者对英国作家格林（Felix Greene）的采访报道，《参考消息》，1976年6月16日。

²³ 网址为：<http://www.uncjin.org/Statistics/WCTS/wcts.html>。

²⁴ 见唐树华：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犯罪发展变化及其理性思考〉，载《犯罪学论丛》第一卷，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。

²⁵ 美国1965年的犯罪人数比为每十万人中2200人，引自 *Crime in the US, 1960-2004*,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, 2006。

儿，我母亲不会特别赞同革命，但革命鼓励女性反抗包办，不随夫姓，甚至可休夫改嫁，也消灭了鸦片、赌博、娼馆以及小老婆，让众多家庭的丈夫免于堕落，为众多主妇摘除心病，足以让她一辈子盛赞新社会。哪怕在每天只有几分钱菜金的穷日子里，哪怕在“文革”结束多年后的富日子里，她也始终把毛泽东的画像高挂于墙——这样的老太婆不在少数。她们想必都能回答蒋介石为之困扰多时的问题之一：“为什么妇女不相信我们？”²⁶

官员的清廉作风被很多民众日后怀念，也事出有因。群众运动说来就来，对早期贪腐多少形成了一定的阻遏。那时当官的薪资本就不高，一旦没忍住伸了手，贪了公家的几个馒头或一个热水瓶，便相当于市场经济发达后的官员拐跑千万巨款，立刻被公共舆论吊打火烧，在大字报的海洋里身败名裂，说不定还丢掉乌纱帽。连刘少奇的夫人出国访问时多备了几套旗袍，邓小平有时打打桥牌，也曾作为“走资派”的著名罪证，在“文革”中传遍四面八方。那时的机关办公楼里常常不见人影，官员们为改革（如合作医疗）和发展（如农田水利建设）奔波，在路上遇到熟人，如不说自己刚从乡下来，刚从车间来，便有些气虚理短。天生长得白胖的，恨不能给自己脸上抹鞋油，恨不能找木匠给自己刨去一层肉，以看齐焦裕禄那种瘦骨嶙峋的标准形象——“这事不用争，自己拿一百张老照片去看吧。”（黄纪苏语）有些官员日后为自己抱屈的一篇顺口溜，确为官场一部并不少见的清贫史：“1940年代流血水，50年代流汗水，60年代流泪水，70年代以后流口水。”

那时的知识分子更是只能夹紧尾巴做人。坐拥豪宅、名车、公司红利、外国银行账号、小清新女助手兼师母天敌……这些反动行径他们想都不敢想，甚至遭到他们普遍蔑视。剽窃论文或索要红包，哪怕是心中

²⁶ 引自前蒋介石新闻秘书郭岱君回忆谈，载《国家机密》，香港明镜出版社2013年。

一闪念，也能让自己吓出尿来，甚至对自己惭愧不已。他们勒上袖套，戴上草帽，风尘仆仆，摩顶放踵，奔波在生产最需要或群众最困难的地方，胃痛了，咳血了，也决不下火线，一心“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”。在他们那里，日记中没记上几条老农民或老工人的感人事迹，就似乎不像日记。不能给晚辈展示手掌里的几块茧皮，也不像个正经的大舅或大姨。他们中的一部分，日后也许痛惜光阴虚掷与专业耽误，愤愤于自己当年降尊纡贵，但有意思是的，2007年由广东省发明协会主办，由搜狐网发起，科技成果评选在全国范围内经多轮筛选，最终评出了中国现代“新四大发明”，分别是（1）人工合成胰岛素、（2）杂交水稻、（3）汉字激光照排、（4）复方蒿甲醚——细数这四大成果，它们无不产生于“文革”，都是精英们降尊纡贵时的作为，与高待遇无关，与知识产权无关。

……

这样的社会变化有多少合理，有多少不合理，有多少合理中的不合理，有多少不合理中的合理，须细心辨析。其中有多少人的奉献出于心甘情愿，一切都甘之如饴，也难以估量。重要的是，与很多局外人的想像相异，即使是被迫跟潮的大多数，他们要死要活地献身革命，一般来说并无枪口威逼，不是迫于美国那样世界上最大的警察队伍、最多的监禁场所、最昂贵的司法开支，倒是更多受制于李双双这样的至爱亲朋，受制于他们一双双揉不得坏人坏事的眼睛。

借前面的比喻：一个政治股市全面沸腾之际，奉献型竞争与攻击型竞争相互推高，全民圣徒化与全民警察化比翼齐飞。人人盯我，我盯人人。达则兼盯天下，穷则独盯其身。盯吾老以及人之老，盯吾幼以及人之幼……几乎人人都是业余的检查员、监督员、巡视官、思想警察。由规劝、批评、斥责、揭发、大字报组成的“群众专政”织就天罗地网，

使每个人都成了照妖镜，同时每个人又都置身于白炽化的无影灯下，时时感受到众目睽睽的道德高压态势，争当公民模范几乎是唯一的人生选择。

全国一盘棋，上下一张网，国家体制建设的诸多难题也迎刃而解。与亚洲、非洲、中东等地太多后发展国家的情况不一样，政府不再仅仅是首都和市民的政府，不再是众多部落首领和军阀合租的空虚门面，共用的前台秘书。史学家黄仁宇极为重视的“底层社会结构”，即国民党在大陆来不及完成的重要社会工程，由红色中国搞定，被他视为现代化一大成就。²⁷ 军阀割据一去不返，连族权、神权、帮会、土司等形形色色的“微割据”（所谓各种“封建”残余）也逐一退出视野。乡村中大批城堡、碉楼、围屋等民防工程失修遭弃，武馆、镖局、拳师等民防手段后继乏人，足见“一片散沙”各自为政的乱象不再。民间暴力悉数解除，行政体系深植基层，穷乡僻壤之地也一片和平，可为这一说法的图解。

多少年后，我在台湾遇到一位退休将军。说起两岸的恩怨情仇，他说台湾的间谍活动在大陆成功率最低，潜伏的几无漏网，登陆的落地即废，基本上有去无回，训练经费全打了水漂。他不知道，他领导过的那个情报机构，面对的远不是派出所和边防站，而是成本低廉和无处不在的大嫂、大叔、大娘、大爷、大姐、大哥、小妹、小弟，是数以亿计的明岗暗哨，包括各路“小脚侦缉队”——他还能有什么胜算？

我同他说不清楚，尤其说不清楚黄仁宇那个“底层”命题。

我只能再给他敬酒。

* * *

全民警察化曾是解决问题的手段，但渐渐成了问题本身，成了制造

²⁷ 见黄仁宇：《中国大历史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2007 年。

各种次生问题的母问题。

红色中国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，逐步积累成患，其中一题于 1964 年进入毛泽东笔下：“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。”²⁸ 后来的“党内资产阶级”与“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”等，不过是这一概念的延伸和微调。对党内“几十万到百万”、“贵族阶层”的说法，似是他的进一步量化评估。²⁹ 没有资料证明他读过意大利托派学者布鲁诺·里齐（Bruno Rizzi）的《世界官僚制度》，或了解南斯拉夫著名异见者吉拉斯（Milovan Djilas），但他的这一系列论断与吉拉斯的“新阶级”³⁰ 一说甚为接近，几乎不约而同，一举奠定了他在全球左翼阵营的地位，与斯大林拉开相当的距离，以至日后不论有多少负面消息曝光，他仍不失巨大的国际声望，一直被很多人惦记，被非洲黑兄弟们往胳膊上刺，被一些欧美院校学子往文化衫上印。1976 年毛泽东去世时，法国《世界报》征集有关时评文章。最终刊登的有九篇，其中八篇充满了赞词。有些法国人戏曰：他们的报纸骂法国总统可以，骂毛绝对不行。

稍有区别的是，有些人愿把他看作爷爷版的格瓦拉，另一些人醉心于他对社会主义体制官僚化的抨击，更愿意把他看作东方版和帝王版的吉拉斯。“文革”中知名的异见者杨小凯（杨曦光），曾为一篇〈中国向何处去〉付出过十年铁窗生涯的代价，但直到入监前他一直把毛泽东视为旷世知音。³¹ 早期的中国异见者也大多为“毛粉”，与撰写过《造反有理》一书的萨特（Jean-Paul Sartre）差不多，与撰写过《长征》一

²⁸ 引自 1964 年 12 月 12 日毛泽东对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，载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》第 11 册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。

²⁹ 引自薄一波：《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》（下），人民出版社 1997 年。

³⁰ 见密洛凡·吉拉斯：《新阶级》，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3 年。

³¹ 见杨大庆文：〈回望“新思潮”〉，载网刊《昨天》第 12 期，2012 年 12 月 30 日。

书的波伏娃 (Simone de Beauvoir) 差不多。

除此之外，泛红群体与泛黑群体的社会鸿沟日深，与官民矛盾形成了一大交叉。华裔作家陈佩华 (Anita Chan)、美国学者骆思典 (Stanley Rosen)、安德佳 (Jonathan Unger) 在〈学生与阶级之战：广州红卫兵派性与文化大革命〉中注意到，在他们所调查的两千名红卫兵中，“出身不好的”在造反派中占比 75%， “出身好的”在保守派中占比 80%。³² 两派的组织成分大异，显示出造反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政治贱民的曲线反抗，其针对点正是毛泽东的“阶级路线”，可说与他一开始就同床异梦，一名而两实。韩裔学者李鸿永 (Hong Yung Lee) 等也都注意到“文革”中造反名义下的诸多民意诉求，特别是历次运动中的受害者，更多关注一种高层外“人民的文革”。³³ 在他们看来，这些利益主张并未超过温饱、尊严、自由的合理尺度，不失为造反运动得以广泛勃兴的一部分真实原因，因此“毛的文革”与“人民的文革”构成了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，不是一回事——他们据此与一般“毛粉”门户角立。

这些学者提到知青、临时工、个体业者、遣返回乡工人、复员军人、其他低薪群体等，比如武汉一个“582”战团，即 1958 年就业但工资一直停留在二级的工人。作为参与造反的一部分，这些群体最关心的不是意识形态，倒是多有经济利益背景。其中，城乡差别又算得上很多人最大的冤屈之源，是全国物质利益分配的最大一笔欠账。杨小凯撰写过《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》，认为知青是最可靠的革命力量，其依据就是他们在政治、经济上的双重受压。我在 1967 年看过一次知青造反派

³² Anita Chan, Stanley Rosen 和 Johnathan Unger: “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: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(Canton)”, *The China Quarterly*, no. 83, 1980.

³³ 参见朱学勤：〈岂有文章觉天下〉，载《开放时代》1998 年 3/4 期。

演出的话剧，剧名是《姐姐你别哭》，可谓中国最早的“伤痕文学”，表现的是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女儿，如何被迫下放农村，如何被农民欺凌与侮辱，其凄婉剧情让观众无不落泪。我没想到的是，多年后路遥的长篇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同样是长效催泪弹，几十年内一直热卖，一再印得印刷机发烫，其共鸣者显然多是与作者相似的乡村儿女——他们对通向城市的一条黄沙小路耿耿于怀，甚至泪眼迷蒙。

两部文艺作品，一是说下乡知青，一是说回乡知青，视角不同且情绪有点拧，但都涉及到城乡分隔这一历史难题和现实不公（包括以“下乡”为经济处罚的政治不公）。“户口”是一个沉甸甸的话题，对于很多人来说如同噩梦。一旦被户口所囚，乡村居民就失去了入城就学、就业、退休的社会权益，就可能永远承受困苦和沉闷，哪怕进城去卖苦力也被视为非法“盲流”，借用一句小品台词：“离流氓也就不远了。”这一口气怎么也没法让人咽下。³⁴ 他们勒紧肚皮以支撑国家财政，为工业化所需要的原始积累输血，凭什么就要被抛出“平等”的大锅饭之外？既然“文革”以共产主义为旗，那么他们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，凭什么被诬为“造户口反”“造经济反”的恶行，被当局一棍子打回去？³⁵ 凭什么在主流造反派那里也得不到足够的支持？

其它社会矛盾还有不少。

显而易见，诸多矛盾有些是全局性的，有些是局部性的；有些是结构性的，有些是技术性的；有些主要是政治性的，有些主要是经济性的；有些是刚性的只能断臂求生，有些是柔性却不妨调和……可惜不少人对

³⁴ 1955年6月22日，国务院发出《关于建立经常的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》，强化了户籍管控。同年8月国务院又颁布《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》，禁止农村人口向城市自由流入。

³⁵ 见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等四部门等关于禁止“造经济反”的《通知》，以及同年7月13日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《通知》。

此心不在焉。马若德与费正清认为“文革”的社会基础是“军队、激进文人、不满现状的青年”，³⁶ 有点让人不知所云。“不满”什么？哪些“文人”激进？军队内部的激烈纷争（如“二月逆流”事件）³⁷ 该如何解释？两位哈佛教授如此随意打包，似乎是瞥一眼新华社的照片就做研究，在长安街转上几圈就着手写论文。影片《芙蓉镇》出自国人之手，作为批判“文革”的经典之作，受官方与业界大力推崇，竟把剧中人物圣魔两分，红脸对白脸，还把白脸直接挂钩“国营”企业，把红脸一律批发给“民营”人士，同样让人不知所云。作者似乎从未在中国生活过，不知亦圣亦魔才是最为普遍的国人履历，更不知“上海工总司”“武汉钢工总”“长沙工联”那些故事里，³⁸ 造反与“国营”不“国营”一毛关系都没有。

毛泽东也表现出目光迷乱。身处全球冷战的格局，中国被迫卷入了财富、军事、文化等力量对比悬殊的全球拼争。他在一张世界地图上看不到多少温情，于是很容易把物质利益之争、行政磨擦之争、文化差异之争、认识侧重之争等统统视为意识形态较量，甚至把人脉派系、作风、方法、性格、意气等方面的磕磕碰碰，读入思想有色眼镜，读出清一色的阶级斗争，须链接国民党特务的暗杀，围堵中国的数百个美军基地，还有印尼右派军人政变的血流成河……这一切始终成为他处理国内问题时不在场的第三方，才下眉头，又上心头。1964年他与刘少奇有关“四清”运动性质的争议，显示出双方认识的生涩，理不出清晰头绪。

³⁶ 见马若德与费正清合著：《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》，海南出版社1992年。

³⁷ 指1967年2月谭震林、陈毅、叶剑英、徐向前、聂荣臻等对“文革”的激烈批评和抵制。

³⁸ “上海工总司”全称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。“武汉钢工总”全称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。“长沙工联”全称为长沙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。以上均为当时著名的产业工人造反派组织，数以十万或百万计的国企员工卷入其中。

他最终把“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”和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奉为警世恒言，把“突出政治”视为治国重典，于是一切都开始敏感化、严重化、政治化、敌对化，不能不让人茫然和心悸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论什么都拿来“上纲上线”，一种政治挂帅的杠杆化操作，很快就使社会生活全面变形，各地、各业、各级的攻击型竞争由此失控。

新政权确实对手环伺和困难重重，但这种“攻击”演化成捕风捉影、添油加醋、夸大其词、深文周纳、混淆敌我、村村冒烟、四方告急，八百里快马进京……造成第一假相是反革命的“裴多菲俱乐部”遍布全国（1957），第二假相是庐山会议后彭德怀的同盟者大有人在万分危险（1959），第三假相是“党内、政府内、军内、文化界的很多人都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分子……”（1966）更多的假相也随之而来，亡党亡国的危险似逼近目前。以至在后来的日子里，人们到图书馆随便挑上一本书，都能在字里行间看出包藏祸心的蛛丝马迹，因此无需当局下文件，当局也下不了这么多文件，但各地书架上早已空空荡荡，读者和管理员下手更快。

其实，一种盛产假相的体制弊端，是矛盾中最大的矛盾，问题中最大的问题，危险中最大的危险，却不幸成为长久的盲区。那些官僚主义也好，特权意识、野心家、贪污什么的也好，算不上特别稀罕，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，放在任何一种社会体制里都有，与“阶级”和“资产阶级”到底有什么瓜葛？与剩余价值、资本垄断以及美国第七舰队是不是一回事？出现在汉朝、唐朝、明朝的贪官污吏，是否也是美国中情局派出的穿越高手，嗖嗖地勾兑时空，哗哗地隐身附体，正在古代营构福特公司和杜邦公司的生产关系？国企与私企都可能出现的制假、骗售、偷税、隐秘排污等，是否都源于统一的培训和派遣，与什么所有制扯得上？再往细节上说，法学和经济学或有阶级性，但乘法九九表是否

也有阶级性？一个人在白天收地租有阶级性，但夜里读唐诗或打老鼠是否也有阶级性？显然，人类历史并非只有一个蒸汽机时代，只有一个充满机油、烟囱、贫民窟的时代。“阶级”诚然是群类辨识的重要视角之一，重要方法之一，重要的集合模型与分析单元之一，但并非全部。“阶级”一词的有效性往往系于贫富悬殊，特别严重和突出在小康线以下的时代，当民族、宗教、文化、生态等矛盾突显时却未必，其边际效应很可能减退——反之亦然。

换一个角度说，凡有人群的地方，无论贫富都有坏人，是需要道德来处理的；无论贫富都有罪人，是需要法律来处理的，并不一定都适用“阶级斗争”这剂猛药。阶级问题也有变形或转化的可能，需相机处理，因症施治，另谋解决之法。相当一部分现象与其说是群体的问题，不如说更像个人的问题。与其说体现了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，不如说更像是人类对自身弱点的斗争，甚至是每一个人肉体与精神之间的永恒紧张——即便在阶级淡化之时也是如此，在最好的社会里也是如此。富足版的原始部落不会比阶级社会更像天堂。

因此，“阶级”只是普遍逐利行为的衍生社会构造之一，同其它构造一样，不过是社会诊状，至多是次级病因。对它不能不讲，但不能讲得过分，不能当染房漂染一切。不幸的是，“文革”深受二元对立的冷战思潮纠缠，其政治虚热和敌情过敏，与冷战对手恰好形成了同构。在很多后人看来，它差不多就是美国麦卡锡运动的镜像，一种逆向的高倍数放大。³⁹

大势已成，积重难返，意识偏执与体制扭曲相互强化，缺乏制动闸

³⁹ 1950~1954年美国以“麦卡锡主义”为代表的反共和排外运动，使约两千万人受到政治审查及不同程度影响，75位作家的书籍被列为禁书，史莱辛格、马克·吐温等人的作品也成为“危险书籍”，近两百万册书籍被清除。

的全民警察化一路咆哮向前。连刘少奇的女儿也开始写大字报揭发老爸，⁴⁰ 于是再不可思议的爆料也都像实情了，再离奇的情节也都有了可能。到处都有攻击成习、攻击成癖、攻击以为荣的效忠者，不断制造出新的“敌人”——包括把一部分人果真逼成了敌人，事实证实了臆想。“信则有，不信则无”，涉及人类社会的很多奇怪纠纷就是这样“信”出来的。到处都有大嘴巴、是非人、告密专家、政治暴发户，不再满足于攻击落后思想或低俗行为一类小靶子，更愿意成天瞪大眼睛，双目如炬，精神抖擞，叱咤风云，一心挖出身边的“定时炸弹”，以证明“千万颗红心”中有我一颗。无论是村里王小二断言老地主看天肯定是盼望国民党的飞机，还是朝中老臣怀疑彭德怀见苏共首领时不带翻译必怀叛国之意⁴¹……他们的口气一样，表情一样，越来越凶险，使全国上下弥漫着好斗风格和阴谋想像。我身边的一哥们，就曾夸耀他在一幅山水画里发现了暗藏的反动标语，在人民币钞票里发现了蒋介石侧影，闹得大家好长一段日子心惊肉跳。

一切条件都已具备。圣徒化与警察化两大政治泡沫交汇，“文革”其实已呼之欲出。在毛泽东那里，后者夸大敌情，提供了他发动“文革”的必要性；前者美化民情，提供了他发动“文革”的可行性。目的有了，手段也有了，他下一步该如何办？

他是该去赏花，还是该去钓鱼，还是该去北欧哪个宅子里与美国总统和苏共总书记微笑碰杯？

⁴⁰ 见清华大学《井冈山》报第八期，1967年1月7日。

⁴¹ 彭德怀1959年的反“左”意见，被1962年“七千人大会”实际上予以大部分吸纳，但他的主要罪名“分裂党”、“里通外国”出自很多同事对某些细节的猜疑和揭发，可见全民警察化在高层同样造成敌情过敏及妖魔化想像。参见黄峥执笔的《王光美访谈录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。

1966年的“5·16”通知⁴²下达，“文革”大幕正式拉启。毛泽东在随后近两年间瘫痪了全国的党团组织，让各级政府主官几乎统统下课，鼓励学生闹事和工人夺权，容许造反派自由结社、散传单、烧档案、封报馆、扛机枪、占领官府大楼、全国免费大串联……一个西方记者如果此时在中国人面前说教“民权”，肯定觉得自己班门弄斧。我的一位周姓朋友，郊区农户的儿子、湖南“高校风雷”的头儿，因被总理周恩来点名参加一个紧急会议，商议省会各派大联合的国是，竟一身臭汗和两只破鞋，坐上部队临时调配的一架双座军机急飞北京。离开军用机场，他手枪还别在屁股头，进入人民大会堂时居然无人加以安检和拦阻。如此零规矩、大撒把的“民主”和“自由”，如此奇异的群众当家作主，恐怕连好莱坞导演们也觉得匪夷所思。哪个编剧要是写出这种情节，肯定会被老板辞退，让老婆急召心理医生。但这一类离奇情形和故事在中国确实发生了。党政休克和全国大乱的试验，或如哈佛教授认定的“民粹主义”核爆，在世界范围内空前绝后，构成了“文革”的早期面貌。

其中的道理也许并非特别奇怪：

既然“几十万到百把万”“贵族阶层”（毛泽东语）已劫持各级政权，为什么不该闹他一个全面造反？

既然“六亿神州尽舜尧”（毛泽东语），那么闹一个天翻地覆又有何风险？直接诉诸群众难道不是把握最大和成本最小的胜利之道？绕开那些科层制的官僚机构，摒弃那些体内消化的关门整肃，来一个全面的揭盖子、清底子、刨根子、攻打土围子，难道不是又一场最为得心应手的人民战争？

他的奇想，看上去也是精算与深谋。

⁴² 即1966年5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发出的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》，被视为“文化大革命”纲领性文件。